

## 胡风与《时事类编》<sup>①</sup>

[日]千野拓政 朱晓进译

### 引 言

1933年6月15日归国的胡风<sup>②</sup>，其后一边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发行的杂志《时事类编》上发表为数很多的翻译，一边以宣传部长、秘书长身份活跃在左联书记处。此外所写文章极少，因此《时事类编》和左联的工作无疑是该时期胡风生活的中心。但一年后的1934年10月末（到11月初），胡风却因与国民党关系的谣传而被从左联书记处逐出，在此前后也辞去了《时事类编》的工作。而且，这个谣传不仅在当时影响了胡风的人生，在解放后的胡风批判中乃至文革后的名誉恢复之前仍长期作为罪状，持续地束缚着他。

作为给他带来如此悲剧的谣传的根据，不外乎所谓胡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时事类编》工作的事实。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被归结为直接的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否得当，可以说是已经很清楚了。但此事却长期影响了他人人生，而且这一工作作为他回国活动的起点又是客观事实。如此看来，中山文化教育馆到底是怎样的组织，《时事类编》是什么样的杂志，胡风在那里做什么工作，对于胡风有着什么样的意义等问题，无论是为了解胡风生平还是考察他文艺思想的发展，现在都仍然是必须弄清楚的。

## 一、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活动

中山文化教育馆是“以倡明中山先生的主义和学说、建立三民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的基础、育成民族的生命、使中山先生在文化上永远地留下纪念为主旨”<sup>③</sup>而设立的教育机关。其设立的经过，据曾作为馆长的孙科的回忆，是如下的情况：

……民国二十一年冬，我去上海旅行，与党内上层同志多有往来。其间，大家都感到巩固我国基础之必要。而且不应仅停留在实际的军事性、政治性力量方面，在文化方面也应是基础稳固。原本中国文化的源流是很古老的，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到了总理的三民主义是为集大成者。然而说起当时的情势，我党的文化基础是极其薄弱的，马克思主义非常流行，社会科学的书刊多受其影响。为此，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为三民主义文化的复兴计，有将此发扬的必要。于是，发起成立了“中山文化教育馆”的组织。<sup>④</sup>

该文化教育馆的设立趣旨，与31年11月国民党四全大会上被采纳的《党义教育实施方法改进案》内容是相一致的。<sup>⑤</sup>因而理所当然地在该馆的发起人中包罗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要人，财政方面也由国民党中央给予月額五万元、上海市政府给予年额五万元的补助，是靠国民党的支持来进行其活动的。<sup>⑥</sup>

但是，中山文化教育馆并非国民党的党内组织。孙科进而这样谈道：

本来，总理的建国教诲不仅是我党而且是全体国民的公共财产。因此，从道理上讲，该馆即使由政府或党来设立也并无不可。但是当时国内从事文化事业的十有八九是党外文化人，一般的学生和教员也持三民主义仅为国民党之经典的错误观点。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山文化教育馆如果仍由党和政府来设立，会越发招致误解。因此，根据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发起，作为民间的学术组织打出来。这样，翌年1月召开了发起人会议。

中山文化教育馆是有意识地从国民党分离出来单独设立的民间的文化教育机关。而且，就人员构成来看，如后所述与国民党中央持对立立场的亲孙科的人物以及党外的民主人士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山文化教育馆于1933年3月12日在首都南京的陵园举行了成立大会，开始了活动。虽曾决定以南京为中心并在各地设立分馆，但实际上直到南京本馆建成都是在上海法租界福熙路803号开展业务的。胡风在该馆工作也是在这个时期。教育馆移至南京是35年2月20日的事。<sup>⑦</sup>

该馆成立时，选出理事长孙科和8名常务理事、29名理事。<sup>⑧</sup>该馆的活动在其指导下进行。常务理事会经多次会商之后，确定了如下业务部门及其负责人：

秘书长 叶恭绰

财务理事 叶恭绰 黎照寰

事务部主任 李大超 副主任 李庚

研究部主任 黎照寰 副主任 刘大钧

出版部主任 史量才 副主任 陈彬和<sup>⑨</sup>

该馆职员含理事共58名<sup>⑩</sup>，其他包括若干从外部招聘的研究员、调查团员，开展着各种业务。其主要内容如下：<sup>⑪</sup>

- (1) 学术研究（对孙中山思想研究以及有关中国现阶段各种重要问题的共同研究予以资助）
- (2) 实地调查（将调查队派往各地，调查农村的社会、经济、教育状况）<sup>⑫</sup>
- (3) 学术奖励金的支付<sup>⑬</sup>
- (4) 奖学金（以学生为对象）的支付<sup>⑭</sup>
- (5) 学术讲座（以一般市民为对象）的开设
- (6) 图书、定期刊物的出版
- (7) 研究所<sup>⑮</sup>、图书馆<sup>⑯</sup>、博物馆的设置

以上各业务在33年6月25日的常务理事会上通过了计划、预算，工作得以开始。且不说其后该馆转移南京，就是直至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移所武汉、重庆的北碚，其工作到42年仍在继续。

本文论及的《时事类编》，承担其编辑的当然是出版部。该部的具体工作是发行如下刊物：

《时事类编》——旬刊后改半月刊。发行到5卷15期（1卷共14期、2卷共28期、3、4卷各22期。1933年8月~1937年8月）。在上海创刊，35年2月与中山文化教育馆一同移至南京。抗战爆发后作为《时事类编特刊》（月刊）发行至70期（1937年9月~42年1月）。发行地从37年12月（6期）起移至汉口，从38年3月（18期）移至重庆。刊物内容始终以政治经济为中心，专载从外国杂志译介的时事性论文。详情将在后面叙述。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发行到4卷3期（1934年8月~37年4月）。在上海创刊，35年移至南京。是登载从政治经济直至文学艺术的涉及面很广的各种论文20多篇的大型杂志。

《期刊索引》——月刊。发行到8卷4期（每卷6期。1933年11月~37年8月）。在上海创刊。35年2月起移至南京。各月定期刊物的纪事索引。

《日报索引月刊》——发行到7卷3期（1934年5月~37年8月）。各种报纸的纪事索引。

《天下》——月刊。英文杂志。未详。

其它各杂志均是随着抗战开始而停刊的，唯《时事类编》仍延续发行至42年，由此可看出该杂志占据了出版部活动的中心位置。而且，确实与此刊地位相对应的是，胡风之外的沈兹九（《申报·妇女园地》的主编）、已是名人的胡愈之、新人杂文家徐懋庸等等都曾执笔于这个杂志。

那么，编辑该杂志的出版部内部是怎样的情况呢？在该出版部之下的《时事类编》又是以怎样的形式营运的呢？还是先来看看

出版部的状况吧。

## 二、围绕着出版部的人们

如前所述，出版部在主任史量才、副主任陈彬和负责下进行工作。但实际上是谁在掌握其活动，与上层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关于这方面的内情，从34年途中加入《时事类编》的翻译者、曾有过引发胡风辞职言行的韩侍桁留有如下意思的回忆：

中山文化教育馆原来是孙科指派王昆仑主办的，王昆仑就让陈彬和搞了一个班子，象沈兹九、胡风等都在里面。<sup>⑭</sup>

从这个证言可以窥见陈彬和及其在出版部的工作情况。这里，他搞的所谓胡风、沈兹九等《时事类编》的翻译者“都在里面”的“班子”，乃是指出版部而非其它。

关于陈彬和其人，胡风曾遗有如下证言：这时，孙科出钱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刚刚成立，陈彬和任出版部主任，出版《时事类编》半月刊，……（陈当时也是民权保障“大同盟”的活跃人物，又是红色记者）。韩起（胡风归国后投靠的朋友——引者）的朋友杨幸之（湖南人）在那里当秘书，陈的文章几乎都是他写的。杨幸之通过韩起拉我到中山文化教育馆为《时事类编》翻译文章。<sup>⑮</sup>

陈彬和实际上是出版部副主任，胡风的记忆有误，但从另一方面也暗示出，出版部的工作事实上是由陈彬和掌握的，以至于在旁观者的印象中是作为“主任”的形象在指挥工作的。

再如前面韩侍桁的证言中，也提供了有关陈与上层关系的意味深长的信息：孙科通过王昆仑指导中山教育馆，王昆仑通过陈彬和掌握出版部。

确切地考察当时的情况，孙科缺少自己全副精力地领导中山教育馆的条件，这也是事实。

在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在该会上，孙科所系的广东

派与南京派国民政府实行了联合)上孙科就任行政院长,因蒋介石派的怠工于上任一个月后不得已而下野,后再度与蒋介石和解,于32年12月返任立法院院长。这个时期的孙科,作为立宪的总负责人,起草宪法当是最大的任务。他当然不可能亲自具体掌管远离首都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工作。

另外,王昆仑,曾作为孙科立法院长任期内的35年的立法委员,抗战开始后在重庆是孙科为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的掌握实权的人物,与孙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根据《中国政党辞典》(宋春等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月)、《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时期人物事典(一)》(郑福林编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5月),王昆仑是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总干事。<sup>⑩</sup>(但其在职期限并不明确,且据笔者调查,在文化馆创立之初的组织中未见有所谓总干事的职务。)

从如上所述的当事人、证言、资料考察,王昆仑作为孙科的心腹,是其与中山文化教育馆之间的桥梁也是事实。但王是否直接指挥各项具体工作(尤其是出版部的工作)还是个疑问。

出版部主任史量才如所周知是申报馆的社长。且根据《昭和八年版外报报纸(上卷)》(外务省情报部编 1933年),当时陈彬和是深受史量才信任的“申报馆”的副主编,实际上代总主编处理实务。<sup>⑪</sup>

而陈彬和的秘书、将胡风引入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杨幸之,是《申报年鉴》的编辑,<sup>⑫</sup>33年1月《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因妻病逝暂停两周编务时,曾代其主持编务。再则,根据胡风《自传》,《时事类编》创刊之初的主编罗又玄,也是“申报馆”的副主编兼经济部长。<sup>⑬</sup>

总之,中山文化教育馆创立之初,出版部的工作,实质上是由申报馆承担的。作为实事,至少可以说,在其出版部内,与王昆仑相比,史量才的影响要大得多。<sup>⑭</sup>史量才动员申报馆接受工

作，实际事务是由其信赖的陈彬和担任的。

然而，依靠于申报馆的出版部的运营并未持续很久。据韩侍桁说：

……有人对孙科说王昆仑靠不住，于是改由钟天心、左恭负责（出版部的工作——引者注）。<sup>②</sup>钟只挂名义，左实际负责。左上任后创刊了《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回忆》）

没有固定职业的韩侍桁，这时受左恭邀请同时到中山文化教育馆开始工作。左恭等接替出版部工作一事，胡风在《自传》中也同样叙述到了，这很可能是事实：

孙科已派钟天心来接替陈彬和的出版部主任，同来的有左恭（后来冯雪峰告诉我他是隐蔽的共产党员）<sup>②</sup>和韩侍桁。

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日期（1934年8月15日）来看，此时当是同年的7、8月份。

此后陈彬和似乎也还在该馆，但他和申报馆的影响在出版部可说是下降了。对这一趋势，同年11月的史量才遭暗杀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这一事件，自身面临着生存危机的申报馆，当然无遐顾及出版部的工作。据陈彬和学生时代的朋友胡山源说，陈彬和也正是在这一事件之后离开申报馆的。<sup>②</sup>

但必须注意的是，左恭等上任后，申报馆的影响虽然减弱了，但各杂志的编辑状况却并未恶化。

例如，《时事类编》一度休刊（34年8月），从同年9月25日重新发行的第1期（2卷22期）起，刊物面貌焕然一新，且开始刊登胡愈之的连载文章，文艺作品的介绍也增加了，无疑，这之后的杂志是更精彩了。徐懋庸在该刊执笔也正是这个时期。

尽管如此，申报馆曾掌握出版部一事，不能不说是具有很大的意义。当时任申报社长的史量才对文化事业广泛参与，积极支持民权保障同盟等等，作为比较慷慨的实业界人士是有名的。只

因为出版部是受其支持，胡风在经友人介绍后才不作推辞便进入《时事类编》工作。而且从上述情况看来，该组织即使有国民党的援助，也是与党相脱离的文化教育团体。再则，据胡风讲，去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一事曾向左联书记处作过汇报：<sup>②</sup>

我在书记处报告了这种情况（该馆的内情和他被物色进馆的来龙去脉——引者注），茅盾、周扬他们（当时的行政书记、组织部长——引者注）都主张我去。（《自传》）

如果是那样，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担任工作，被看成是与国民党的关系而遭到非议，并由此让其辞去左联书记处的职务，这在胡风看来无疑是无故的。

胡风辞去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工作，是34年11月的事。<sup>③</sup>而35年2月中山文化教育馆迁移南京时又有许多成员交替。与胡风有密切交往的沈兹九、张仲实也从该馆辞职，胡愈之也与该馆断了关系。与此同时，申报馆在该馆出版部的影响也绝了迹。

### 三、对胡风来说的《时事类编》

那么，《时事类编》具体地说来是怎样内容的杂志？胡风在此中承担的又是怎样的工作呢？而这一切对胡风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些与前面所述的内容有重合之处，但这里试图将胡风在职的情况变迁包括进来加以考察。

《时事类编》1933年8月10日创刊。最初是旬刊。胡风在创刊号上便已登载了两篇翻译，可以看出他最迟在7月中旬便已开始了工作。包括出版部在内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各项工作，其计划被批准、预算下达都是在同年6月25日，因此，胡风等于是从创刊的准备期开始时就参加的。

“该杂志的编辑工作仅由中山文化教育馆作过粗略记载，据胡风回忆，主编辑是罗又玄。每期约60页，各登载十多篇论文，其内容是：“一、从各国著名杂志中选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重

要著述翻译。二、收集世界当前重要的各种统计。三、介绍外国人关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批评。”（各期《編集凡例》）

翻译作品均从英、法、德、俄、日各国语种的杂志中择选，而每国语种似乎均拥有数名固定的翻译者，胡风是其中之一。翻译阵容的主要成员是：<sup>⑳</sup>

英语：陈岳生、陈问路<sup>㉑</sup>、马润庠、严鸿瑶、王显廷、徐卓英<sup>㉒</sup>、韩侍桁<sup>㉓</sup>

法语：李万居<sup>㉔</sup>、陈逸凡

德语：潘惠田

俄语：张仲实<sup>㉕</sup>、吴清友、樊英

日语：胡风、力生、沈兹九<sup>㉖</sup>

此中，李万居、马润庠、潘惠田在该馆迁移南京后仍留任并挂编辑名。其时主编已是钟天心（见《时事类编》3卷16期版权页）。

而且，仅从胡风的译文推测，所有译文，当是全译，至少胡风的翻译是如此。

胡风翻译的几乎都是政治经济方面的时事论文，其内容选择似乎也并非全由着他自己。<sup>㉗</sup>不过有些论文也许是胡风自己选择的，例如相当数量的以敲响当时世界性危机的警钟为论旨的文章，以及从涉及日中关系的由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发行的《无产阶级科学》、《读书》、《文化集团》、《唯物论研究》等左翼系杂志上翻译的文章。而从这样的选择中亦可看出，他当时的读书倾向虽还未具明确的形态，但此中却可窥出他思考方向的端倪。

而且，每篇译文都相当长，从原载杂志发行到文章译出并登载，其间周期之短，可看出胡风是以相当的速度倾力进行翻译工作的。他的阅读和吸收无论从量还是从其速度看都是非常大的。

也许因为这样的缘故，胡风的译文形成了逐语译出的近于直译的体式。而且，他日后的文艺批评所具的独特文体，其特征在

这样的译文中亦已比较明显了。譬如，将日本的用语原封不动地引入的措词、“的——”的多种用法就是其中一例。而胡风独特的、在结构助词中“的”和“底”的分别使用，也早已在翻译中野正刚论文时就显示出来了：具体说来就是原文日语作为“の——”的场合译为“底”、此外的场合译为“的”的区别。如此说来，胡风独特的文体可以追溯到他从事日语翻译时即已养成。<sup>⑤</sup>

如前所述的《时事类编》的编辑体制持续到34年夏，在8月15日发行的2卷21期上登载的《本刊启事》中说：“在此……发行一周周年纪念特大号，此后将休刊一个月，至9月10日继续出版。休刊期间将一意专心于本志内容的改革和充实”，其时是在大幅度地改组，这正是在左恭等被派遣去出版部之后。他创刊了《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要亲自考虑编辑事宜，因此《时事类编》的改革与人事的变动不是没有关系的。

实际上，从9月25日发行的22期起，《时事类编》的面貌为之一新，每期100页左右，论文数也增至15篇左右，分为“世界论坛”、“学术论著”、“时事漫画”、“人物评传”、“文艺”各栏目登载。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也被强化，内容当然更为多彩。此中较显眼的是设立每月一次胡愈之解说上月世界动态的栏目“×月的世界政治”。这从22期的《编后记》所述的“特请胡愈之先生长期主持”也可看出（实际上随着该馆迁移南京，才连载3次便中断了）。

胡愈之参加《时事类编》的执笔，实具有重要意义。如所周知他通过邹韬奋与生活书店有很深的关系，而当胡风的友人张仲实35年2月从中山文化教育馆退職时，由胡愈之介绍进了生活书店成为编辑。就是这个张仲实，36年约请胡风写下最初的文学评论文字《文学与生活》，并承担编辑由该社出版的。（后来胡愈之夫人沈兹九从该馆退職后也成了生活书店发行的《妇女生活》杂志的主编。这与胡愈之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但二人最初相遇也许正

是在中山文化教育馆。) )

胡风从中山文化教育馆辞职后专志于笔耕活动，但他的文坛活动与许多人物有关。其中鲁迅和黄源的存在固然是不应忘记的。而由于与张仲实的关系，在《时事类编》形成的圈子中人对其也有很大帮助。如果胡愈之不加入《时事类编》，且如果张仲实不与胡愈之相遇、也与胡风不相识，那么情况也许就会不同。

在考察胡风的文艺理论的发展时，不能忽略胡风与张仲实的因缘。张仲实在《时事类编》2卷21~22期上翻译了苏联文学顾问会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在3卷4期上翻译了法捷耶夫的《我的创作经验》，后来集成一册单行本。而胡风为该书写了书评，就“形象的思索”的问题作了介绍。

张仲实翻译的文章，接受并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创作方法举例加以解说，文中批判了充满“政治的杂音”的标语口号作品和“以议论代替表现”的哲理小说，指出“文艺作品……不仅是理智，也根源于感情。”对此，胡风作了如下概括：在创作过程中，作者的思想或观念和对象间的化合作用逐渐地完成，或者被对象所加强，或者被修改而渐渐深入的。经过这样的过程，被表现的形象才是活的形象，那样的思索（形象的思索）才是艺术家的本领。

在这个阶段，胡风仅是将这一概念作为作者必备的能力之一提出来的。但这对胡风来说，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经过长时间酝酿，在抗战中发展成了胡风现实主义论的中心概念之一的“形象的思维”。<sup>⑩</sup>胡风理应是在《时事类编》上看到张仲实的翻译的，这意味着，胡风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在《时事类编》时期孕育而成的。

以上诸多事实也许可以说明，文艺批评家的胡风确实是在《时事类编》的活动中以及在该志时相遇的人们中间培育出来的。在《时事类编》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摇篮期左翼文学青年的姿

态。

然而，他的脱颖而出，却经历了巨大的磨难。关于当时的艰苦生活，胡风这样谈道：

我当上了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日文翻译，给每期《时事类编》译一至二篇文章。我提出只上半天班，他们（陈彬和——引者注）也答应了。但我的工资是翻译人员中最少的，只一百元。（《自传》）

实际上，对刚从日本归来的无名青年（当时31岁）来说，这也许不是条件很差的工作，甚至可以说这在尚无生活着落的他已经很好了。而且每天只要工作半天，是一项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他擅长日语的才能和立志于文学的趣向的工作。因此还不如这样说，在这段话中包含了胡风对自己能力的自负。而且从这段话中亦可看出，他以惊人的精力从事翻译工作，对作为左联的宣传部长、秘书长的的工作也同样倾尽全力。

这年（32年）的12月，胡风与梅志结婚，翌月夫人怀孕。虽谓喜事，但他却是：

我怕生活上拖不起（不仅是经济上，还有时间和精力上），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就让她去打胎。（《自传》）

那时他先是用药，但失败了，后来到鲁迅介绍的日本人开的医院去动手术，但也未成功，让过些日子再去。这种状况之惨，到了胡风“不忍看”的程度。所谓幸福对胡风是遥远的事。

左联的工作，新婚的家庭，为了维持这些而去《时事类编》工作，并中断妻子的妊娠。那个时期的胡风一定是在拼命地干，在这种严峻的状态中，他作为文艺批评家的自我品格也正在胚胎着。

如此看来，信赖他、庇护他的鲁迅对他来说将是怎样的存在啊！而对迫使他默认无故的谣传并从左联书记处辞职的周扬们，他抱着怎样的情感呢？其结论似乎是可以感觉得出的。

## 注释:

① 本稿参照了(A)《归国后的胡风(其一)——围绕左联中胡风与周扬的关系》(《人文学报》198号,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1988年3月)、(B)《两个资料——胡风归国的日期以及关于穆木天的转向》(《法政大学教育部(纪要)人文科学编》第70号,1989年1月)以及相关的《归国后的胡风(其三)》。

② 胡风归国的日期一向根据他本人话被当作是七月初,实际上是同年的6月15日。

③ 中山文化教育馆章程第2章总则第2条。(《第一回教育年鉴》1934年,出版社不明)。

④ 孙科:《八十述略》(《传记文学》23卷5期,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

⑤ 在同一方案中载有:“中央年来励行党义教育”,而“综合其结果,收效甚微,却使一般学生感到三民主义的空虚、枯燥、无意识。”“因此,改进党义教育实施方法”“拟将党义渗透到各种社会科学中”。“在学校中,不仅党义教育,即使是社会教育,以及文艺,同样有渗透的必要。如何编制大量的三民主义的社会科学书籍以及三民主义的文艺书籍呢?为此,不可没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中央依据事实的需要,定期创办大规模三民主义研究院培植人材。”(引自波多野乾一《国民党通史》)。这种对现状的认识以及对设置消除官民差异的学术组织的思路,与孙科在《八十略述》中所述的情况是相通的。而且业已看到,这些似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总则里被原封不动地接受了。

⑥ 《申报》1933年3月12日《教育消息》栏。

⑦ 《申报》1935年3月1日《教育消息》栏。

⑧ 常务理事:蔡元培、戴传贤、吴铁城、叶恭绰、史量才、郑洪年、孔祥熙、黎照寰等8名。理事除孙科(理事长)和常务理事外有:林森、蒋介石、汪兆铭、胡汉民、于右任、吴敬恒、张人杰、张继、宋子文、李石曾、居正、陈果夫、伍朝枢、顾孟余、杨庶堪、张定璠、王云五、薛笃弼、马超俊、朱家骅等二十九名。(《申报》1933年3月13日《教育消息》栏)。

⑨ 《全国文化机关一览》中国出版社(台北)1973年(1934年刊的影印版)。

⑩ 根据《第一回教育年鉴》(1934年)。

⑪ 向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各省派遣了调查团。(《全国文化机关一览》)。

⑫ 关于学术奖励金、奖学金,在《申报》1933年6月29日《教育消息》栏,发表了

其支付及其目的诸规则，同年开始实施。

⑭ 关于研究所，根据《申报》1933年6月25日《教育消息》栏，陈正谟等二人作为研究员被招聘。

⑮ 关于图书馆，向各机关、书店求援，进行搜集。作为响应，民智书局、儿童书局等都寄赠了各社自己的出版物，即使是个人，作家费哲民也寄赠了藏书数千册。《申报》1933年4月16日以及23日《教育消息》栏）。

⑯ 韩侍桁：《我的经历与交往》（《新文学史料》1987年3期——以下略为韩侍桁《回忆》）。

⑰ 胡风：《回忆参加左联前后（二）》（《新文学史料》1984年3期——以下略为胡风《自传》）。这证言在他自己也多少有些讹误。中山文化教育馆由孙科出资是事实，但财政的基础是在补助金。又，《时事类编》创刊之初是旬刊。以上已在本文中涉及到了。

⑱ 而且根据上述两个资料，令人惊异的是所谓王昆仑自1933年以来是共产党员。

⑲ 同书关于陈彬和这样述道：“作为前总主编，去夏因对蒋介石的笔祸事件而退社。曾深受社长史量才信任，最近再度任副总主编，擅长执笔日本及俄国关系的社论。”在关于总主编张蕴和的解说中记有：“……实际上由陈彬和执掌实务。”陈彬和1931年春由黄炎培介绍入申报馆，由史量才推荐为副总主编。所谓对蒋介石的笔祸事件，是指32年春，因写《募集兴国公债》、《剿匪与造匪》的社论，批判将公债充作内战经费的事以及批判国民党的反共围剿政策等引起的事件。陈彬和在32年创刊的《生活日报》也担任编辑部主任（主任是戈公振）。

在这里有值得注意的东西。从如上所述内容以及胡风《自传》中所谓“作为活动家的红色记者”来看，陈彬和似乎是担任着重要的工作，但实际上是有史量才才有他，是因为史量才的信赖的深厚他才担任了重要工作。事实上史量才遭暗杀后，他便从申报馆辞职了（后述）。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似乎有相当的伸缩性，社论和著述几乎是由他人代写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的。而且从在申报馆就职的当时起就与日本领事馆的特工人员有密切往来，辞职后在上海、香港兴办出版社，同时兼办报纸的发行。而抗战开始后，就任日本人接收的申报馆社长，成了御用文化人。战后以此罪被作为汉奸受到起诉而逃亡日本，但相传晚年不得志，于1970年8月在日本的精神病院狂死。（根据《敌伪劫夺时期的申报》，《新闻研究资料》第22辑所收）。

⑳ 《鲁迅全集》第15卷《日记》人物注释项（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㉑ 《昭和8年版外国报纸（上卷）》中关于罗又玄这样述道：“曾就读于早稻田、中央、帝大等，毕业于清华学校和北京大学，以‘穗’和‘晦’的笔名执笔社论。”

⑳ 根据《申报》1933年4月5日《教育消息》栏，在4日的常务理事会上决定，实地调查团的进行，与申报馆合作，由史量才起草计划并负责。这些也显示出史量才和申报馆与中山文化教育馆有很深的关系。

㉑ 钟天心是当时的立法委员，同时又是接近孙科的人物（孙科《八十述略》）。而左恭是中央党部图书馆主任兼《文艺月刊》编委会主任，同样是孙科一派的（韩侍桁《回忆》）。仍根据韩侍桁的回忆，左恭是1906年生。曾与丁玲同期在北京大学听讲。左恭与韩侍桁南开中学时的友人缪崇群在南京均无亲戚（缪在南京任教职），故通过缪与韩侍桁相识。以后二人直至抗战中都是至交（韩侍桁《回忆》）。

㉒ 左恭是秘密共产党员的事似是事实。35年11月从国民党方面试图以多种途径进行国共接触时，左恭应国民党的谏小岑的约谈，并与上海的党组织取得联络，并作为工作人员介绍张子华。（李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历史过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所收，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㉓ 34年9月18日，陈彬和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国耻纪念），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作题为《东北失地痛史》的讲演，所以到这时为止，他仍在该馆是可以确认的。

㉔ 《我所知道的陈彬和》（《人物》1985年5日）。

㉕ 但是矛盾回忆：“那是1934年秋，我从陈望道和郑振铎那里得知……胡风在孙科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内领津贴，每月一百元。……胡风是通过什么关系进去的，我不知道，但他把这件事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保了密，却使人怀疑”。（《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这段叙述否定了胡风曾“报告”过这一情况。事情确否难以知道，但至少能够使人察觉出胡风与茅盾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㉖ 根据胡风《自传》，从中山文化教育馆辞职是在34年10月末。此事与胡风辞去左联秘书长职务是相联系的，据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说，与其辞职前后进行的鲁迅与周扬等全体文委会见（会上田汉发言讲了“胡风是国民党的特务”）是在同年10月末~11月初，所以，这也暗示出胡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辞职是在同一时刻。而且从《时事类编》登载的胡风的译文看，34年10月初出版的杂志登载了他最后的译文，此后便中止了，这也显示在中山文化馆辞职是在同一时刻。

㉗ 名下附\*的人物被认为是自创刊号起的成员。

㉘ 女性。据胡风《自传》中讲似乎是共产党员。

㉙ 据胡风《自传》，兼任英文秘书。

㉚ 韩侍桁最初在《时事类编》执笔是自2卷22期（34年9月25日）即杂志改组号开始的。

㉛ 台湾人。1902~66年。中国青年党员，战后为台湾《新生报》社长。在台湾创建中国国民党，曾有助于民主化运动。

⑤④ 陕西省人。1905~。共产党员。26年在上海大学学习，作为该大学派遣莫斯科的留学生在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留学。归国后担任神州国光社的校勘员，后转入中山文化教育馆。35年2月该馆迁移南京，由胡愈之介绍成为生活书店的编辑，编《世界知识》。后成为该书店的总编辑。有多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译著。抗战中从43年起任党中央宣传部出版科副科长，解放后从54年起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任职时期与胡风曾有交往（张仲实《我的编译生活》、《出版史料》2，学林出版社，1983年12月）。

⑤⑤ 后来的胡愈之夫人。当时是《申报副刊·妇女园地》的编辑。在中山文化教育馆迁移南京时，进生活书店成为《妇女生活》（35年7月~41年1月）的编辑负责人。

⑤⑥ 例如，批判民政党、政友会的懦弱政策，指责其路线不能响应举国一致的呼吁的中野正刚的《检讨国策协定》一文的翻译，据说是陈彬和指定的（《自传》）。但是胡风在其翻译附记中加以批判：“他装着强硬派，而实际上不过是向军部方面献媚”。

⑤⑦ 胡风译文是什么样的直译体呢？关于“——的”的多用和“的”、“底”的分别使用等等的胡风的特点如何体现的呢？试比较以下原文与译文也许就可以清楚了。

しかも‘进言’された言论の自由が何を意味するかは明瞭だ。それは要するに、ファシスト、グループの政策、行动に対する既成政党的、ブルジョマ的、三井=三菱の批判の自由ということに外ならなし。”（永田广志《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胡风译文如下：

而且，‘谏议’所要求的言论自由底内容所指的是什么是很明瞭的。要之，这不外是既成政党的布尔乔亚的三菱、三井对于法西斯群底政策、行动之批判的自由而已。”（《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时事类编》2卷6期）

⑤⑧ 胡风的所谓“形象的思维”概念，作为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环是在对盛行的“形象化”论的批判中提出来的。其要谛是：“形象化”是将抽象的思想和感情活生生地表现在具体的事物上的论点，其结果只是作者的主观在客观事物上的投影，这种表现，仅仅是与现实游离的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感情只有联系着具体的事物，具有着具体的内容（=形象的思维），才可能产生活生生的表现。即“形象化”是观念论，与此相对，“形象的思维”是现实主义的观念。关于“形象的思维”的来历，胡风在《“形象的思维”观点的提出和发展》（《艺谭》1984年3期）中有详细论述。

（原文附录《〈时事类编〉所载胡风翻译目录》，因篇幅限制未发表。）